

身体·性·政治*

——对小说《少男》基于文化政治的解析

张辉¹, 王宗峰²

(1.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外语系,安徽 亳州 236800;2.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已因语境的延异而陷入绝境,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表征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底层书写”对身体、政治和性进行解辖域化并生成为微观政治。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性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关键词】文本欲望叙事;文化政治学;认识论断裂分析;解辖域化;底层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42-04

行而上的宏大叙事话语规则受到时代的延异,文本操演为行而下的微观文化政治学,对身体、政治和性的辖域化就是文化政治的空间生产和欲望书写。本文拟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欲望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式症候阅读,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一、阶级叙事基因

“底层写作”因为着眼底层,又以其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及所谓“新左派”精神而备受关注。同时这种“后革命时代”的“底层书写”也认知图绘了阶级革命语境下经典阶级叙事,这种现象被称作“拟革命书写”,^[1]而这一拟仿现象主要局限于革命发生学阶段。

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在传统经典革命文本(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红旗谱》等)中得到集中体现,旨归在于意识形态的辖域化,以期建构和巩固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这种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二元对立的格式化处理,创设以阶级切分的两个单子群落,两个社群之间势不两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异质性。也正是基于政治基础的相互擦抹,两个社群间的主奴辩证法斗争是必然的,加上革命者运用革命思想的规训和领导,内爆就发生了。后革命时代的一些文本正是对这种革命发生学的基本范式进行了拟仿,即拟革命书写。

就文本而论,“底层写作”潜意识地继承了宏大叙事中革命发生学的部分基因。这种现象在《少男》底层文学文本中也有所体现。这个文本设置了贫富判然相异的两个社群,两种迥然分殊的述行生活。一边是骄奢淫逸的富华生活,另一边则是艰难苦涩的贫寒日子,两个社群的异化性已经很难用

“社会分工不同”的话语范式来辖域,其中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擦抹痕迹并不模糊,实现了缺场中的在场。

在潘小平小说《少男》中,年轻的农民工小九家境贫寒,“父亲死得早,家里六七亩地,一麦一豆,两季庄稼,全靠母亲一个人,农忙的时候,天天干到半夜”,^[2]母亲操劳过度,累成了腰肌劳损,又无钱医治;而城市富婆小陶阿姨老爹则是省内最大的本土房地产开发商,“据说资产近百亿,上个胡润‘百富榜’啥的,没问题”。小九勤俭节约,即便跟表舅在宾馆花别人的钱都痛惜不舍;而小陶阿姨则一掷千金,骄奢淫逸,为寻一夜之欢不惜挥金如土。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生活,两个判然不同的世界,而这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人也难以通约。小九纯洁如玉,正如小陶阿姨的看法,“纯得一尘不染”,“小九是山里的清泉”;而小陶阿姨则如小九所感,“怎么都这么不要脸?”经典阶级叙事中“两个世界两重天”的模式在这个文本中依然鲜明,而且为了强调差异,小说还用心良苦地插入了打工歌手周云蓬的《失业者》和《买房子》,实现了阶级宏大叙事和底层欲望叙事文本的互文性和间际性,借以将底层苦难和城市权贵的奢靡形成了情感结构完全对立的文本叙事场。

综上所述,这部底层作品的欲望书写提供了革命发生学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拟文本,传承着阶级叙事的部分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具有毫无陌生化感的“家族相似性”,开拓了文本叙事的第三空间。但是这种擦抹剩余的革命集体记忆凌空而起的阶级政治话语在远离革命的“后革命时代”还能游牧多久?在这样一个不断“去政治”(其实是去阶级政治/宏观政治)的新时代会如何变化?

收稿日期:2014-04-15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省级科学研究项目“亳州花戏楼砖雕文化解读及英语译介研究”(项目编号:SK2013B304)。

作者简介:张辉(1972-),男,安徽蒙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翻译教学。

这部小说也否定辩证法式地给出了答案:文化政治学转向或微观政治学转向。

二、文化政治学转向

美国非裔女作家贝尔·胡克斯在《向往: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文化政治学,她“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出发,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铸成了侧重研究所谓‘非常规政治’或‘非正式政治’的‘文化政治学’”^[1]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大力推崇文化政治学,同时他们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和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文化政治学所倡导的政治不同于通常情况下的政治概念,它主要指“性别、种族、民族、族裔、性、年龄、地缘、生态等文化权力关系。”^[2]人们不再把目光过多地投向以往的宏大叙事层次上的社会政治学,而是转向了微观层面的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身份族类、欲望、身体、性欲等人性的世界,这些微观政治“崇尚事物的局部性、片断性、异质性、多样性、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3]因为“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世俗化、人间化、日常化的”,“更切近人们的人生、生命和歌哭,比起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来,更多对于人本身的体贴和担当。”^[4]如上文已述,“底层写作”对经典阶级叙事尤其是阶级革命叙事的基因传承主要体现于革命发生学阶段,而越过这一阶段就不可能再沿着传统/经典革命叙事模式游牧下去了。“底层写作”对付这种尴尬局面的基本方案是将潜隐的阶级政治/宏观政治叙事适时地转化为文化政治/微观政治叙事,差强人意地消解、弱化、压抑甚至遮蔽不合时宜的前者,从而使得阶级政治基因产生变异,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受到冲击。“底层写作”的这种方案主要体现在其对身体、欲望和性的处理上,从小说《少男》中,可以见出。

就身体的物质欲望而论,这个文本依然采取左翼文艺家族文化霸权的辖域化来建构两个贫富迥然相异的世界,这既是叙事背景和基础,也是人物活动的动力源。但是不同于革命经典的编码方式,身体的物质性欲望对于贫富两个不同的群体(或者新式阵营)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其实都意味着凡俗生活的更加美好,很难看出与阶级政治的明显关联。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尽管依然劳苦,具备阶级政治的话语基础,但是他们对于物质的追求(身体的物质欲望)不再如在革命经典中那样受到话语压制和遮蔽,而是被赋予了合法性。农村这个

广阔天地如今已经很难让他们个人和家庭获得物质幸福,相反却带来贫困,为了满足身体的物欲和谋求致富机会,他们只好涌向表征财富和机会的城市。如此一来,这几个底层文本就把本该彰显阶级意识和属性(至少也是阶层意识和属性)的阶级政治话语转化为身体的物质欲求与满足这种(欲望话题)与身体政治相关的微观政治话语,这种微观政治叙事即是欲望机器叙事。

对于身体的性,“底层写作”常常将此视为“贫贱者”与“富贵者”产生关联的主要渠道之一。与经典阶级叙事相似的是,这几个底层文本中身体的性交往也是强势群体和底层弱势群体之间的身体运行,只不过进行了性别置换,实现了从菲勒斯中心主义向阴性转化。与革命经典以阶级政治为指向的编码能指和所指的不同,这个文本对不同群体的两性身体交往行为的编码尽量回避敏感且不合时宜的阶级政治话语,文化政治或明或暗地取代或消解了阶级政治。

小说《少男》并没有像经典阶级叙事那样对富贵者怒气冲冲甚至恨之入骨,反倒是充满同情。富婆小陶阿姨的富豪老爹沾花惹草,花钱“填欢”了那些个小婊子,“她妈空守着一堆钱,干枯的脸上却从来见不到一点笑容,活得像老丝瓜一样暗淡落寞”。小陶对于母亲的遭遇心有余悸,于是,“她从心里要定了小九,她想,许他们男人在外头养小女人,就不许我们女人在外头养小男人吗?”可见,小陶阿姨为了避免像其母亲一样成为男权主义文化下的受害者才捕获小九的,这就意味着小陶阿姨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政治色彩,反抗既有的性别秩序和社会编码。小陶阿姨对于弱者小九也不像经典阶级叙事那样势不两立地侵犯甚至施以暴行,反倒是情意绵绵。“自打见了小九,小陶阿姨幡然梦醒,现在最难得的,就是小九这样纯得一尘不染的人,那些个臭男人,她是看一眼都嫌多余。那些个人,哪能和小九比啊?小九是山里的清泉,他们是沟里的污泥。”“小陶阿姨也不知道自己对小九,怎么就那么心疼,真像书上写的,恨不得含在嘴里,吃进肚里。”“小陶阿姨心疼地拿起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挨着个亲吻了一遍,说你怎么就生得这么可人疼呢,九,你可知道姐心里,有多疼你!”从这些湿润的描述可以看出,小陶阿姨对于小九的感受,已经远非身体本身可以涵盖了,而是浸透了柔情蜜爱,经典阶级叙事的鸿沟已被轻易跨越。尽管小九拒绝了,尽管最终小陶阿姨无奈之际采用了不光彩的技术手段,但是这些并不

能否否定小陶阿姨对于小九的真情实意。这样,本可以像经典阶级叙事那样印证阶级政治的故事就被异化成角色错位的情爱及身体欲望故事了,闪现出关涉身体及情欲的微观政治色彩。

小说《少男》中,同为底层出身的陈安堂的行为就与经典阶级政治中的劳动人民背道而驰了,贪慕钱财,不择手段地出卖外甥身体,颠覆了劳动人民的经典政治形象。小九的同事老凯竟然出身富人家,其父为建筑包工头,而且此人在关键时刻还很仗义地帮助非阶级弟兄小九。另外,作为劳苦大众女儿的彩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打扮得跟妖精似的”,鬼混在迪厅里当“摇头妹”。用传统的“圆形人物”理论对此进行解释将陷入绝境,它跟消费主义逻辑、青年亚文化具有一定的交往理性。

三、内在理据探析

近年来,比较惹眼的“底层写作”被认为继承了左翼文艺的遗风,针砭时弊,为劳苦大众仗义执言,心系底层,同情弱者,彰显社会良知、体现人道主义。革命经典文本是针对革命发生学阶段的书写,与左翼文艺是相通的,认同于二元对立的基本建构模式、两个异质性的阶级社群和认同归属等。不管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规训,还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躁动,抑或传统文人的侠肠义胆使然,还是各种因素的化合作用,总之,不少底层文本也或明或暗地演绎左翼风采,这样就和传统革命文艺血脉相连了,只不过与时俱进地变异着,这就是“拟革命书写”现象^[4]。因为相通,所以底层文本具有和革命经典对话的基础,因为变异,所以“底层写作”具有与革命经典比较研究的价值和前景。这种变异的重要话语实践就是对政治和身体及其欲望之关系的处理。而不论革命经典,还是底层文本,对于身体、欲望和政治之关系的处理都有其可供探析的内在理路。

如上所述,革命经典文本,尤其是以书写革命光辉历史来确证政治合法性为己任的革命历史文艺(如“红色经典”),主要产生于以革命现代性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畸形膨胀,政治场凌越于其他场域之上,遮蔽、取代、置换其他场域的功能具有先验的合法性。

在革命现代性的烛照下,日常生活也就是政治生活、私性空间也就是公共空间、个体话语也就是国家话语。这是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辖域化,而这种辖域化的目标指向就是永无止境的纯洁、透明和简单,其动力基础则是“现代性焦虑”,规约的方式通常是再辖域化的改造,而且是不断地经历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对凡俗日常生活的

政治化(革命化)辖域化、对私性空间的公共化辖域化以及对个体话语的阶级化规约其实在根本上都表征着“现代性焦虑”,都是在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力图尽快解决国族焦虑。以革命现代性为根底,建构现代新文化的飞地,创造新生活,落实到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革命及其阶级政治这种宏大叙事谱系学的去政治化,对身体及其欲望进行文化政治学的再辖域化。

对于革命经典所讲述的历史生活,依据主导意识形态的译译、擦抹和杂糅,就应以阶级为标尺的黑白分明的政治化生活。这种所谓的“真实生活”不是客观现实生活,而是已经被意识形态刻录化的生活。那么,这种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就鲜明地印证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想象性关系”或伊格尔顿所说的“想象性转变”。与之相应,革命经典中的身体及其欲望也就应该是被意识形态化成黑白分明的阶级政治符码。于是,革命经典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力量在对身体进行话语层面的刻录化书写时,就难免将身体政治化和革命化。在福柯看来,身体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具有被动铭写性,那么,“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5]革命经典对身体的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权力关系代言,借助于革命意识形态的权威力量对身体进行话语层面的铭写,也就是对身体的话语操纵。而这种对身体、政治和欲望关系的处理方案到了多年之后的“底层写作”中就内爆了。

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底层写作”是所谓“后革命时代”的文艺现象。一个“告别革命”之后的远离革命时代,时过境迁,加上曾经的“极左”风潮给阶级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后革命时代”的阶级政治已经逐渐式微并且颇为敏感,今天的人们往往对此采取回避的态度。随着阶级话语的式微和淡出,人们的思维方式、知识谱系和话语范式都已与时俱进,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自然也因时而化。“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给国家带来丰富物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组。”^[6]这种强烈的阶层分化和固化现象发生了认识论断裂,已经很难用“社会分工的不同”这种话语深描和认知测绘了。“后革命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非正常的阶层差异和冲突,尽管时代发生了变化,“压迫与被压迫所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并未消失,甚至更为坚固。符号领域肯定会记录这一切,不论记录的意图是维护、反抗还是隐瞒这种结构,或者制造种种合理的解释。”^[7]于是,“底层写作”应运而生。

令人触目惊心的客观现实不断挑战社会良知的底线,不断刺激着人们久违的革命集体记忆和潜藏暗隐的关于阶级政治的集体无意识。于是,在被宣称“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却依然以各种方式确证革命的延续性,依然无法回避与革命的藕断丝连。阿里夫·德里克主要针对西方社会的关于革命遗风的论断^[8]对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却也有警醒和启迪作用。“断裂社会”的赫然出现^[9],社会现实的巨大裂变涤荡着人类固有的天性,对社会公平、正义等良善愿望的迫切呼唤催生了所谓“新左翼精神”,阶层甚至阶级话语受到关注。文艺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捕捉着上述社会生活,并以现实主义精神介入现实,“底层写作”功不可没,欲休还说地以苦难书写(拟写革命发生学)按捺不住地撩拨着社会的阶级政治无意识和革命集体记忆。陈晓明认为:“‘苦难’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文学依然具有社会历史意识,同时是在阶级冲突的潜意识中被表达的。”^[10]此处所谓“阶级冲突的潜意识”所表征的其实就是社会的阶级政治无意识和革命

集体记忆。但是,诚如上文所言,在一个毕竟“告别革命”(且不管能否真正告别,但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毕竟曾有真诚告别的主流声音)已久的“后革命时代”,“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恐怖后遗症使得人们常常谨慎地回避阶级政治话语,“底层写作”也因此将革命经典文本中对身体、政治和欲望关系的编码方式进行了否定辩证法式地变异处理,于是就出现了上文所述底层文本对身体、政治和欲望关系的新型编码擦抹,基本方案就是将刚性的阶级政治软着陆,力图转向身体政治、性政治这种似乎不显得那么剧烈的文化政治,也就是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

底层文本对身体、政治和欲望关系与时俱进的处理不妨看成因为“在现行社会中似乎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表达话语”而于情急之中抓到的替代性话语,藉此试图缝合陈晓明所说的文学观念与社会观念的悖论,但并非他所称的“美学的脱身术”^[10],依然主要属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不妨姑且拟仿为“阶级政治的脱身术”。至于能否真正脱身,那就另当别论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Michel Foucault, "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trans. Colin Gordon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223.
- [2] 潘小平. 少男[J]. 清明, 2012(1). 本文中凡涉及小说《少男》的引文均同此。
- [3] 姚文放. 文化政治学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J]. 文学评论, 2011(3).
- [4] 王宗峰. 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以电影《光荣的愤怒》、《天狗》、《苹果》为例[J]. 当代文坛, 2011(3).
- [5]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27.
- [6] 王宗峰. 人民美学与角落书写[J]. 电影艺术, 2007(5).
- [7] 南帆. 后革命的转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78.
- [8]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3.
- [9] 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206.
- [10] 陈晓明. “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 文学评论, 2005(2).

Body, Sexuality and Politics: Analysis of Boy Based on Cultural Politics

ZHANG Hui¹, WANG Zong-feng²

(1.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Bozhou Teachers' College, Bozhou Anhui 236800;

2. Information School of Huaibei Teachers College, Anhui 235000)

Abstract: The basic way to deal with the body and desire is to politicize, discipline and encode it with Marxism grand narrative in revolutionary canonical texts. Marxism grand narrative representing, however, in post-revolution era, micro-cultural politics falls into aporias because of contextual difference in politics, thus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comes into being. Bottom narrative, in recent years, deterritorializes body, politics and sexuality and becomes micro-politics. The trace of biopolitics in textual desire is delved, thick description of encoding way to heterogeneity by comparison of the two different leftism texts on the relation among body, politics and sexua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exact analysis of text signifier of the novel *Boy* by means of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Key words: textual desire narrative; cultural politics; analysis of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deterritorialization; bottom narrative (责任编辑:周锦鹤)